

# 从拉格比到大林园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女性与自然分离与结合的主题

谢 鹏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 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对其中女性与自然关系的揭示尚不多见,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探微书中自然与女性相分离又结合的关系,既有助于理解劳伦斯矛盾的女性观,同时也批判了西方父权制将女性等同自然的本质主义观点。

**关键词:** 劳伦斯;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生态女性主义; 女性; 自然

**中图分类号:** I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2004)05-0052-12

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惯于将世界作两分,如文化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理智与情感,精神与肉体,物质与意识等,在“欧洲人父权制世界观中‘阳性’与理性、精神、文化、自主性、自信和公众领域相联系,而阴性则与情绪、身体、相关性、被动性和个人领域相联系。这种二元对立贬低‘阴性’推崇‘阳性’,认为阳性是相对于阴性的更高的存在物,阴性只能依附于阳性而存在”<sup>[1]</sup>。因而在这种二元对立的体系中,男女的对立也就可以置换成文明(culture)与自然(nature)的对立,男性是文明的代言人,女性是自然的象征物。

再者,因生理上、心理上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相连续性,在文明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里,女性如同自然,代表的是原始、被动、情感、柔弱和神秘,需要由进步、主动、理性和强壮的男性来引导和开发。久之,女性与自然间有亲近性(affinity)已然是个深入人心的观点了。美国女作家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出于对历史文化的考证和对现实生态危机的关怀,得出了一个新颖而又颇有价值的结论:“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我们是具有自然观念的大自然。是哭泣的大自然,讲述大自然的大自然。”<sup>[2]</sup>玛丽·戴利(M. Daly)在《妇科/生态学》(Gyn/Ecology)一书中,认为“妇女的解放进程应该是使她们从男人的‘驯化’、‘剥夺妇女斗志’的文化世界中解放出来,重建妇女与她们过去那个原初的‘野性’、‘强壮’的自然世界的联系”<sup>[3]</sup>,在此,玛丽也认定自然乃女性之原初(original)本质。

20世纪英国小说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浓墨书写了自然与女性的境遇,女主人公康妮与“文明愁城”拉格比相分离,走向了生机的大林园,最终完成了与自然人的结合。浅薄论之,这似乎恰恰证明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天性近自然。但细参读之,发现作品的主旨有与生态女性主义背离之处。

## 一、女性:作为自然的密友

收稿日期: 2004-03-22

作者简介: 谢鹏(1978-),男,湖南湘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与女性文学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一个女性主义思潮,其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patriarchy)。”<sup>[4]</sup>劳伦斯(1885-1930)虽非这一理论的创建者,但自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c)世界观形成以来,妇女和自然就遭受父权制控制的厄运,在对英国工业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基础上,劳伦斯先于生态女性主义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艺术地加以表现,因而可以说他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先驱(proto-ecofeminist),他的作品自然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具解析潜力的文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主题就可作此视角的解读,作品揭露了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困境,进而在批判父权制压迫的同时也歌颂了女性与自然的反抗。

### (一) 揭露女性与自然的双重困境

书中女性与自然的困境有象征性的联系(symbolic connection),在幽暗阴郁的拉格比庄园和丑恶的米德兰矿区,砖墙小屋寒酸肮脏,树林是阴森的,绵羊是灰色的,到处是一片死亡的气息。“拉格比庄园工业小镇坦弗舍象征着现代社会、特别是二十世纪英格兰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整个工业界、社会秩序和精神面貌”<sup>[5]</sup>。康妮来到此后,心情就像周围的环境一样阴郁,终日守着下半身瘫痪的克利福特,她也渐渐地萎靡凋谢了,与有生命的世界脱离关系。有一段时期,康妮真“觉得自己是给妖魔的谎言,给可怖的白痴的残暴压得要死了”<sup>[6]</sup>,因而她尽可能地常常逃到树林里去寻求慰藉,因为“树林里的老橡树紧紧地被关闭着,与世界隔绝”,正和康妮遭受着同样的困境。

在自然遭遇困境时,矿工的妻子们也成了受害者,她们失去了健康活力的丈夫,贪婪的机械化的世界,在毁灭树林,摧残吊钟花的同时,一切可以受伤的东西在铁的蹂躏之下近乎消灭。在这样的环境里,康妮有点象玉簪花似的易伤地嫩弱,而其他“近代的女性全是树胶品和白金”。

不独康妮,拉格比庄园的女性全都处于被控制的状态。女管家干枯老朽了,是个毫无苟且的老东西,博尔顿夫人遭受着矿主们的欺压,而尽管她以讨好上层阶级欢心的姿态接受克利福特的“王侯式”的威严,换来的却是“有用的废物”的“赞赏”。

总之,在拉格比这没有灵魂地窖中,自然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倍受摧残,自然的困境与女性的困境在观念上有着一种应和与同声。

### (二) 批判父权制的双重控制

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困境是工业文明的双重控制造成的。小说尖锐地鞭挞了父权制控制的方式、手段和恶果。克利福特们的控制依靠的是金钱、机械、吹嘘和鞭子,而他们控制的形式又是多样的:对自然的控制有形可见,如森林的砍伐,开采新煤矿;对女性的控制则是无形的潜在的,是用虚伪抽象的假道学和“文明的”制度施以精神的控制。“克利福特的第一条大罪就是他将他的妻子拖入了他自己的空虚的生活轨道中”<sup>[5]</sup>,而一旦女性连同煤矿、森林等自然资源被掌控于矿主手中,带来的结果便是生命的萎缩,生态的破坏。劳伦斯借督克斯和爱娃姑母之口预言父权制文明就要崩溃了,指出它正向着深渊中崩毁。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英格兰正生产着一种迷醉于金钱及社会政治生活,而自然的直觉的官能却是死灭了的新人类。

因此对父权制的批判,既要控诉它对自然的破坏,更重要的是批判其对女性(人性)精神的奴役。作者还用克利福特自我言说的白描式的方式来批判父权制的文明,克利福特无耻地宣言:“他们(工人们)并不是如你所想象的真正的‘人’。他们是你所不懂的,而且你永远不会懂的动物。”作为父权制统治逻辑的代言人,他说,“现在我们所要执在手里的是一条鞭,而不是一把剑。群众是自从人类开始直至人类末日止,都被人统治的,而且不得不这样”。而不管克利福特是作为文明人集体之象征,还是个体之代表,都被康妮否定了,“你并不能统治,……你不过比他人多点钱,把这钱去使人替你服役,……统治什么?你是从头到脚干涸的!”<sup>[6]</sup>

如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瓦伦(K. J. Warren)教授所言,压迫性的观念构架是造成一切压迫统治形式的观念根源,父权制世界观由二元思维方式、价值等级制度和统治逻辑构成,是一种特殊的压迫性观念构架,而它正是控制女性和控制自然之始源。劳伦斯对父权制统治逻辑的批判可谓切到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

### (三) 歌颂女性与自然的双重反抗

劳伦斯在批判的同时以热情笔调歌颂了女性与自然共同的反抗。文明愁城里的康妮起初以为习惯了,问题便解决了,她像林中的老树一样,含忍着,然而终又不安于她们的宿命。康妮遇见梅勒斯后,她肉体里常有着深深不平的感觉,那感觉燃烧到了她灵魂的深处。“以她的生命牺牲于克利福特,究竟有什么用处?”她对灵魂的追问,开始了反抗之路,随后在与文明社会的冲撞中,近乎取得反抗的胜利。

自然也在反抗。从静穆的大树身上,可以读到不屈的意思;母鸡尖锐的咯咯声,“大概是每当被人迫近时的女性的忿怒”。在某个可爱一天,莲馨花也会灰灰地盛开着(*be broad*),花枝招展的,再也不畏缩了,绿油油的玉簪向上举着(*rising*)一串串的蓓蕾,毋忘我草乱蓬蓬地繁生(*fluffing up*)着,楼斗菜乍开(*unfolding*)着它们的花苞。处处都是蕾芽,处处都是生命的突跃(*the leap of life*)。

作为被压迫的对象,自然和女性常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反抗,在反抗中她们结成联盟,增进了亲近性(*affinity*)。但女性的反抗不同于自然的反抗,前者更直接见效,康妮抛弃了虚弱的克利福特,最终与梅勒斯结合;而自然表面上不能主动抗击,只在困境之中温柔地呻吟,书中也未提到自然“报复”的胜利,但很快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中看到了这种“报复”强劲的冲击力。自然一旦对人类破坏行径失去忍耐力,在生物链的某个环节,在新陈代谢的某个周期,她的报复更具灾难性,她将报贪婪狂妄的人类以干涸、洪流、疾病、瘟疫、能源的匮乏和气候的变异。

小说中康妮的叙事视角和一些文字片段也体现了劳伦斯作为“原生态女性主义者解放的意愿”<sup>[7]</sup>(*proto-ecofeminist desire to liberate*)。书中有一段借康妮的视角极为详尽地描绘三个工业村镇及其周围方圆数十英里的半工业化了的乡村的面貌,一路上康妮观察了矿工的工作及其家庭生活情况,整个地区留在她脑海中的移动着的画面便变成了由人类本身所造成的破坏使大地表面变得千疮百孔、混乱不堪的惊人的图像,进而批判了工业资产阶级给自然带来的灾难。这种从女性的立场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对大自然的伤害,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有别于“生态批评”的观物视角:是男性(*man*)而非整个人类(*human*)造成生态危机的恶果,“人类中心主义”其实质是男性中心主义。书中多次出现的“相互联系”、“有机体”、“生命”等字眼,批判克利福特将花儿比做“未被奸污的幽静的新妇”,在语言上肆意炫耀着他作为男性的优越感等片段都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内涵。

基于以上文字,人们不得不承认女性和自然的诸多联系,但这并不是推导“女性是自然的”的充分条件。20世纪工业文明大潮将女性吸纳到文明社会的各个领域,文明社会出生的人,文化因子后天以顽强的姿态与他们黏着在一起,女性亦不例外。女性的真实处境究竟是怎样的呢?

## 二、女性：徘徊于自然与文明间

将全书作粗线条的划分,情节可归纳为:康妮与拉格比的对抗——徘徊在文明与自然之间——与大林园的结合。读者一般也认为作品揭示的主题之一是:女性与自然必然的结合。但其实,伴随她与自然结合的主线(兴奋——坐寐不安——脱离愁城——作为妇人出世——雨林中的交媾——选择自然人)同时还有一条与文明世界分离的副线(忍耐——拒斥——厌恶——恐怖——对抗——离婚)。两条线是互为因果,呈螺旋型交替前进。在反抗文明中,康妮渐行渐远,而同自然日益相融,对文明社会的憎恨促进了对自然的亲近,而对自然的亲近反过来又扩展了对文明的仇恨。在这个动

态过程中, 康妮徘徊文明与自然两者间是更不容忽略的真实。

婚前康妮是身兼自然和文化两重气质的健康的女子, 在有教养的父母的熏陶下成长, 学识不低于男子, 她和姐姐“一方面是世界的, 一方面又是乡土的”。嫁入拉格比后, 康妮渐失了自然的健康, 不断地与文明发生冲突; 她同梅勒斯初遇、结识、结合的进程, 与她对米克里斯、克利福特、拉格比的文化人与日俱增的憎恨是互动的。康妮从未与“自然人”梅勒斯毫无他顾地结合, 她总是偷偷地来大林园, 又匆匆地离去, 与梅勒斯结合时, 心里仍萦绕查泰莱爵士的阴影, 背负着文明的道义。这个追求自然的女性, 始终无法摆脱文明梦魇般的追随, 直到书的最后都未能畅快地呼吸一口纯净的自然空气。康妮更多时候是经历着两条背向的情感线, 处于文明与自然体系无尽的纠缠中。

| 文 明 体 系          | 康 妮 | 自 然 体 系       |
|------------------|-----|---------------|
| 克利福特 主人          |     | 梅勒斯 仆人        |
| 有爵位的贵绅、上流社会      |     | 退役的中尉、守林人     |
| 拉格比              |     | 大林园           |
| 贵族阶级、剧作家、实业家、科学家 |     | 矿工            |
| 文学、清谈、打字机、思考、辩论  |     | 花、松树、小鸡、触摸、感觉 |
| 虚空的、冷漠、等级        |     | 有生命力的、平等的、联系的 |
| 墙, 愁城            |     | 钥匙、乐园锚地       |

康妮最大的痛苦是, 始终在新旧生活之间“自由飘荡”, 在“文明的监狱”和“自然的乐园”之间交叉穿梭。“只有康妮灵活多变地扮演某种代表人物的角色; 只有她的行动的自由自在才使小说有了戏剧性。当她穿梭往来于不同领域——不论从空间或从内心的感知来看都一样——从拉格比庄园到猎场看守林中的小木屋, 她的经历就生动地表现出相互冲突的两种不同的精力。在随后到来的在充满活力和死气沉沉这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中, 她一个人既是战利品又是战场。……小说正是不折不扣地置人于这种局限之中的。连劳伦斯本人也明白, 生活本来可以按照别的格局来安排的, 在这本小说中事情非常清楚: 查泰莱夫人——我们——不可能两者兼而有之。生机及其对立面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妥协。”<sup>[5]</sup>在此朱利安·莫伊纳汉论证了: 选择生命或死亡, 自然人或文明人, 结果只能是一个。但在选择的过程中, 康妮就常徘徊在这二者之间。

最有说服力的是, 康妮对自然人几次犹疑的态度。交往之初康妮不确信梅勒斯对她的爱, 曾刻意地压抑自己的欲望, 连续几天没有去林中; 在康妮闻讯梅勒斯陷入与前妻的婚姻官司中时, 她也有过一次激烈的动摇, “也许还是脱离他, ……他也许真是庸俗下贱的人呢”。

康妮选定了自然人, 但与她同样处境的, 劳伦斯第一部小说《白孔雀》中的贵族妇女在工业巨子和“自然人”的二选一中, 却挑选了那位大亨, 而有生气的自然人终于病死了。与康妮“女性自然化”(naturalizing women)的发展轨迹相反, 博尔顿夫人却逐渐“文明化”, 她接受了克利福特的教育, 学会了打字, 玩扑克, 渐渐地得到了除金钱以外上流阶级之所以成为上流阶级的所有东西。

总之, 女性或者奔赴自然, 或者屈从于文明, 并没有偏于一端的选择, 而选择的过程必然是挣扎于两种力量的纠缠中。

女性对文明本不必如此深恶痛绝, 以至于可以了无牵挂地奔向自然。现代人终摆脱不了文明的烙印, 即便是典型的自然人“梅勒斯”, 他也曾经文“化”, 公学出生, 热心读书, 最后还得在文明人的公司里谋生计。女性逃离社会到大自然寻求安慰, 只是因“文明”社会名不符其实。因对“文明”社会不满, 许多男性也归附自然。一些久居官场的男性文士, 仕途受挫时, 不也选择了复归山

林吗？陶渊明能识辩南山之真意，亦如李清照懂得“湖光山色与人亲”；自老庄以降，李太白，范文忠公等男性思想家哲人，不也识“山水之乐”，自然之情性吗？西方的哲人如梭罗、海德格尔，也告别了“文明的美国都市社会”，告别了文化之策源地——学院讲堂，而择山林而简居。

长期徘徊在拉格比与森林之间的状态，这倒像是人类集体处境之象征：永远在自然与文明之间取舍，永远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挣扎。青山清水地的少年，向往灯红酒绿的喧哗；居庙堂之高者，向往处江湖之远者之闲雅。“如果说查泰莱夫人代表我们自己，代表着所有那些不知何去何从的现代人——他们尚未下决心去解决自己最终成为拉格比庄园主人式的人还是拉格比树林中生活着的仆人式的人，或者是准备生活在巨大的抽象中还是生活在有生命的万物中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恐怕这样一个设想不见得十分荒谬绝伦”<sup>[5]</sup>。

纵览劳伦斯作品体系，他笔下的男性和女性既是文化的又是自然的，如有文明男性查泰莱、格楚德等，自然男性梅勒斯、安拉贝尔等，文明女性莫瑞尔夫人、克里斯特娃等，自然女性康妮、克拉拉等。这种矛盾性，一方面诚然是源于作品对象（自然或女性）本身的多义性和矛盾，另一方面则可从作品主体——劳伦斯本人来找原因。劳伦斯是矛盾的，他的思想也是“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的结合；他在生活中“最痛恨男女之间的淫乱关系”，却又不惮在小说表现有争议的性爱主题；他对女权运动在战前战后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劳伦斯信奉的是一种“双重性理论”——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重性，具体到人的本性来说，“每个男人包含有男女两性，女人也同样包含有女性和男性”<sup>①</sup>。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往往使他自己都不能调协。如韦清琦所理解的，劳伦斯“分别把自然与男性、文明与女性等同起来，造成特异的母子、夫妻对立，这种对立的实质来自作家男性中心主义和崇尚自然之间的无法调和性”<sup>[9]</sup>。苏联劳伦斯研究者季·基·让季耶娃指出了他作品的创作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事实与效果的矛盾，劳伦斯的“学说”和他笔下的“故事”之间常常存在“错位”和“失调”的现象被理解为其“本人在痛苦的求索之中的困惑与矛盾心理的自然流露”<sup>[10]</sup>。

劳伦斯作为推广其学说的哲学家他是失败的，但作为表现了复杂矛盾的人之真实处境的小说家他又是成功的。所以，在阅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时，康妮的徘徊在思想上给我们带来了困惑和费解，但在艺术上留给我们的却是深沉的思索和回味。他常通过小说人物来做乌托邦的构想，然而这些人物在现实中注定是要碰壁的。康妮与自然既分离又结合的矛盾也正是因他的“女性学说”与“女性故事”的错位，他要借助康妮奔赴自然来批判文明对人的戕害，从而表达他理想的自然人的追求，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康妮不能无牵挂的奔赴自然，所以在作品中康妮就只能在劳伦斯编织的自然与文明世界间徘徊。

### 三、结语

“人人都是既有男性气质，也有女性气质的。社会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sup>[3]</sup>瓦伦强调，无论是把妇女等同与自然，还是解除妇女与自然的联系，两种态度都不能使妇女受益；她坚持，“生态女性主义者必须同等地看待男人和女人，他们全都一样既是‘自然的’又‘文化的’”<sup>[3]</sup>。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sup>[11]</sup>。

人类集体从原始自然的蒙昧状态共同迈向了文明理性的昌明社会，男性女性都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西方父权制世界观将“自然女性化”（feminizing nature），“女性自然化”（naturalizing

<sup>①</sup> Lawrence D H. 托马斯·哈代研究. 伦敦：海因曼公司，1961. 转引自万莉. 拯救人类的“希望”——D. H. 劳伦斯的“双重性”理论简述.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 34(4): 72-75

women)的观念,是出于对女性的贬抑和歪曲的目的。文明与自然是一种权利分配话语,而不是性别特质的归属,资产阶级贵族小姐会指责卑贱的男性农奴为野蛮的;不足三百年历史的美国,可以宣称千年文明古国为野蛮民族。

生态女性主义者关于“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的论断,不免有出于策略考虑之嫌:弘扬女性文化,发挥女性原则对生态危机的现实困局的解救作用,进而抨击作为生态危机之始源——父权制文化。这一观点本身,在生态女性主义者阵营内部并未达成共识。

然而,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劳伦斯矛盾的女性观。自然固然值得尊崇,但女性身上文明的因素不可否认,就劳伦斯的女性观而言,他是推崇自然女性的,而抨击被文明毁坏了的女性(而非文明女性)。《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艺术地表现了女性徘徊在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真实处境,小说情节的螺旋交织结构,又为它增添了动态的艺术美感。

#### 参考文献

- [1] 斯普瑞特奈克·C(秦喜清译). 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J]. 国外社会科学, 1997, (6): 62-65
- [2] 格里芬·苏珊著(张敏生, 范代忠译). 自然女性[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293
- [3] [美]帕特南·罗斯玛丽·童(Rosemarie Putnam Tong)(艾晓明、朱坤领、束永珍等译).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4] 陈喜荣. 生态女权主义述评[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55(5): 522-526
- [5] [美]莫伊纳汉·朱利安. 查特里夫人的情人: 生命的真谛[A]. 见: 蒋炳贤. 劳伦斯评论集[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173-203
- [6] Lawrence D H (饶述一译).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 [7] Donovan J.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Reading the Orange [A]. In: Gaard G, Murphy P D.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C].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74-96
- [8] 韦清琦. 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J]. 外国文学, 2002, (3): 34-38
- [9] 郝素玲, 郭英剑. D. H. 劳伦斯的困惑与矛盾[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23(4): 85-88
- [10]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33

## From Wragby to the Wood

XIE P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Hunan, China 411105)

**Abstract:** Few essays have fastened on discussing on the them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an and nature in D. H. Lawrence's *Lady Chatterley's Lover*. Vie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this paper practically explores the alienation-and-comb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woman, which will help to understand Lawrence's inconsistent women thoughts, meanwhile criticizes western patriarchy's essentialism – equating woman with nature.

**Key words:** D. 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Ecofeminism; Women; Nature